

超媒体：下一代传媒竞逐的制高点

——关于“超媒体”概念的学理阐释

文 | 张君昌

【内容摘要】超媒体是指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下，多媒体信息之间相互叠加、高度融合、自由交互的传播状态。建立在多维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把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用计算机技术加以重构，实现媒体间的优势互补和自由链接。超媒体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传播的价值在于互通。智能互联将使超媒体应用覆盖更多领域，与精准服务互为表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理将随着超媒体时代到来而发生极大改变。

【关键词】单媒体；多媒体；超媒体；超媒体时代

“超媒体”还是媒体吗？它与“多媒体”“跨媒体”有何区别？与“融媒体”有何区别？当笔者2001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关于当前广播改革热点的思考”研讨会上首提这一名词后，不断遇到类似质询。在上述疑问中，前者是把“超媒体”简单理解为“超越”媒体之上，进而产生它是否归于媒体的疑惑；中者是缺乏对单媒体、多媒体以及跨媒体原本涵义的认识；后者则是把被定义项归结为一种现象描述。这些议论在当时是新鲜话题，观点莫衷一是在所难免。时至今日，媒体融合理念已蔚为大观，我们不能再昏昏然，应该回归原点，厘清基本概念，搞清我们从哪里来，再思考向何处去。

一、关于超媒体定义

“超媒体”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的名著《数字化生存》，该书英文版完稿于1994年11月。也就是说，尼氏提出“超媒体”概念至少比我要早7年。在该书中尼氏提出，“超媒体”(hypermedia)是“超文本”(hypertext)的延伸。超文本是计算机拥有的超级链接的方法，特指按信息之间的关系建立的一种存储、组织和浏览的方式，内中含有指向其他文本的链(link)，用户不需要顺序阅读，而可根据需要或兴趣自由跳跃、选择阅读内容，并且这种选择权和控制权掌握在用户手中。“你可以把超媒体想象成一系列可随读者的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讯息。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开，从多种不同的层面予以详尽分析。”显然，这是基于超媒体的技术学词根作出的解读，它与原发技术有着天然血缘关系，具有物理层面的稳定含义。

笔者在构建超媒体定义时，尚未见到该书的中译

本，仅是从传播学角度诠释。笔者认为，“超媒体时代是建立在诸多媒体相互叠加并且高度融合基础之上的多维传播时代……这是一个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互重叠、有机结合而成的新型传播阶段。”建立在多媒体传播平台之上的超媒体，将把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用计算机技术加以重构，实现媒体间的优势互补和自由链接，“以推拉结合模式既保障快速供给，又及时的梳理、分类对用户进行贴身式服务”。这里已经具备融合、迭代的传播学阐述。可以看出，尼氏定义除了有技术学词根，更偏于形象化比喻；而笔者的界定更强调传播学的理性规范，尽管彼此表述方法不尽相同，但其中的要义是相通的，即超媒体是指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下，多媒体信息之间相互叠加、高度融合、自由交互的传播状态。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堪称一个崭新传播时代的来临。

当我们开启一个概念时，必须考证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媒体通常是指存储和传递信息的载体，它是引导传受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质。当这种载体仅以声音、图像、图形、文本等其中一种信息形态存在时，我们称其为单媒体；当这种载体能够将多个单媒体信息聚合为一体，并进行存储、处理、传输和显示时，我们称之为多媒体。多媒体技术对于我们处理以声音、图像、图形、文本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信息带来了方便。但是，如何描述多媒体之间的信息关系，如何对各种多媒体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使各种信息达到有机整合、交互传播，是多媒体技术力所不及的，由此便产生超媒体技术的研发。

尼氏指出：“不要只把多媒体视为个人世界的博览

会,或是结合了影像、声音和数据的‘声光飨宴’。多媒体领域真正的前进方向,是能随心所欲地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而达到这一目标时,正是超媒体的诞生日。可见,超媒体是多媒体的升级概念,它是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对于多媒体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更高形式,且是一种飞跃式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传媒集团正在进行生产流程再造,他们利用网络技术将不同种类、不同形式、不同来源的信息用超文本结构组织起来,在各条当日新闻之间,已发事件与未发事态之间,动态新闻与背景资讯之间,文字新闻与图表、图片和音像素材之间建立链接关系,让用户根据兴趣和需要自由浏览,从而实现信息加工生产的集约化、多样化和互动化,拓展内容产品的深度、广度和获取的便捷度。

自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理论上的挑战者。但是,随着《数字化生存》的出版,麦氏的这一著名观点被颠覆。之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一系列新科技投入应用,不断拓宽传播视域并重新定义媒介。“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以前,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业各自为政,现在汇流在一起,产生了整合宽带系统。……这个系统集声音、图像、数据于一体,并有按需存储和交互功能。”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麦氏无论如何没有这种“大汇流”的体验。于是,有人惊呼:“媒体融合时代”到来!“融媒体”说便应运而生。

其实,作为一种形象的叫法,“融媒体”通俗易懂,也便于普及。但融合只是超媒体的特征和表象之一,是超文本链接技术赋予超媒体的天然能力。用一种特征(哪怕它再显著)来概括事物全部,显然有失大观,不符合学理的严谨性要求。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导致超媒体诞生的物质载体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其他名词均不具备技术原发性,今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信息技术出现,传播将长期处于超媒体时代,其间出现任何阶段性迭代产品均不具备划代价值。因而,超媒体具备作为名词被定义项所需的持久、稳定的素质要求。

二、关于超媒体景观

熟悉“数字化生存”的尼氏这样描述超媒体的传播景观:“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

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如果我第一次说的时候,你没听明白,那么就让我(机器)换个方式,用卡通或三维立体图解演给你看。这种媒介的流动可以无所不包,从附加文字说明的电影,到能柔声读给你听的书籍,应有尽有。这种书甚至还会在你打瞌睡时,把音量放大。”

为了便于理解,尼氏还以收看体育比赛为例,描述超媒体景观。接收装置可以把接收到的足球数据转换成录像供你观赏;也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接收这些数据,让你收听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转播;或者干脆把比赛的图解演给你看。在每一种情况下,你收看的都是同一场球赛和同一堆数据。当这些数据仅仅被转换为声音时,声音媒介迫使你只能边听边想象球员的动作,而不会耽误你开车。当数据被转换为录像时,发挥想象的余地少多了,但却很难看清球队的技战术,因为球赛场面混乱,还常有人压人的现象。当数据被转换为图解的时候,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双方的攻防策略一览无余。

循着《数字化生存》的导航,我又找到了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他对未来传播景观的描绘,更富浪漫情调:“当你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物体要求显示关于它的信息时,你就在使用‘超级连路’的一种形式。超级连路让用户从一个信息区域迅速跳跃到另一个信息区域,就像科幻小说中的宇宙飞船通过‘超级空间’从一个地质空间跳到另一个地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超级连路会在你碰到问题并感兴趣的时候帮助你找到答案。假设你正在观看新闻,你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与英国首相走在一起,你想知道她是谁,你用电视的遥控器指着这个人,这个动作就会带给你关于她的小传,还有最近出现过她的其他新闻报道名单。指着名单上的一件东西,你就能阅读或观看它,无数次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视频、音频和文本信息。”

比尔·盖茨所谈的“超级连路”,是指超文本中的文字、图形、图像等页面元素与该文档中的其他元素或者其他超文本文件等之间形成的链接,我们通常叫作“超级链接”或“超链接”。这种技术与多媒体相结合,就是前文所述的超媒体。显然,比尔·盖茨所描述的超媒体愿景还有想象的色彩,但是,想象恰恰是发明的开始。自从电脑进入人类生活以来,“新生代”总

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具“数字化”。我们相信未来的“数字一族”能够把比尔·盖茨的想象化为现实,正如一句广告词所言: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三、关于超媒体传播

在描画超媒体时代蓝图时,我们不仅要基于科技发展提供的可能,更要针对目前所处时代诸多亟待变革、不尽如人意的方方面面:媒体多而无序,信息杂而失调;媒体须臾不在,而社会坐标却飘忽不定;大众离不开媒体,却又不肯轻易相信;国际传播秩序不平衡,常常引发文化争端,等等。既然谁都不敢忽视媒体,却又为何不能彼此坦诚相待?这是因为媒体传送的杂乱信息,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有时甚至暗藏玄机。它“以一种比普通政治体系快得多的速度(让人们)了解各种事件,使得一些事件甩开了政治家们,甩开了他们的深谋远虑而独立地向前发展”,使得人们面对媒体时,总会亦喜亦忧,担心其背后的“无形之手”。这些问题是现实传播所无法根除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划时代的革命性更迭。

国际上开始重视信息传播不平衡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促进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进一步的相互传播”的主张。1976年3月,不结盟国家在突尼斯召开新闻部长会议,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会议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成为信息统治的牺牲品,这种统治是对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文化价值的打击”。1976年8月,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科伦坡发表《政治宣言》,郑重指出:“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两个月以后,发展中国家向第31届联合国大会和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议案。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7年成立了“研究传播问题国际委员会”。1980年,该委员会向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递交了题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天与明天》的报告。报告提出“必须纠正目前国际信息交流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不能抹杀文化的差异性、需要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等重要观点。

这些对传播现状表示不安或不平的指摘,将在超媒体时代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并且得到相关制度保障。因为,超媒体时代以四大特征为标志:一是逐步形成国际文化共同体和传播新秩序认同;二是媒体公信力进一步提

升,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三是传媒生态因融合而发生深刻改变,信息流动趋于平等;四是建立完善的媒体运营规则,构建多边、透明、安全的全球网络治理体系。所谓“世界是平的”“人人都有麦克风”“媒体无处不在”等,正是上述特征的生动写照。

信息在超媒体间自由而平衡地流动,终将使民族文化“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这句话与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异曲同工。文化具有无限的渗透力,这种力量的创造者当然会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世界已经离开了依赖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超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特点,将进一步彰显其公信力,媒体在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将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它影响舆论、控制舆论、引领舆论,成为组织社会的有生力量,也使社会治理多了一种可以倚重的现代手段。

从传播方式讲,媒体正在逐渐从“推送”信息发展到“拉取”信息。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带给传媒新的内容结构方式——个人定制、即时发送、社交论坛等,受众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他们开始成为自主选择媒体、自主选择内容的“用户”,同时又生产和传播内容。媒体的传播方式逐步从“单一”变成“多元”,从“单向”变为“互动”,从“封闭”转成“开放”,传者与受者的界线日益变得模糊。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超媒体传播对人类社会进步将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然而,超媒体时代不是一日可以建成的。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诸多矛盾。首先,传播自由与秩序问题。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一样,既倡导自由,又需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行主体却是现实的。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各方均应明确权利义务,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网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其次,网络空间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信息鸿沟不断加深等问题。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

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为推动这些问题根本解决,“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是最早关注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治理的国家,2015年组建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旨在为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国家规划、科学决策等提供战略和技术支持。在德国,《网络执行法》从2018年1月1日开始生效,规定社交网站必须在24小时内删除在其平台上登出的非法内容,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2018年内修订新闻法,遏制“假新闻”借社交媒体传播,包括“删除相关内容、关闭相关网站或涉案用户的账号”。英国和意大利也有相关的立法动议,包括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雷霆手段。从2014年起,旨在推动建立国际互联网共治机制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中国乌镇,通过连年召开大会,倡导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尊重差异、凝聚共识、直面风险、谋求发展,让更多国家分享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共塑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美好未来。

四、关于超媒体时代

至于新的传播时代应该叫什么,目前称谓颇多。择一二列举: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对等传播时代、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时代、后传播时代,等等。虽然网络可以兼容多种媒体,但毕竟不是“替代”,以单媒体涵盖多媒体,把传媒之未来统称“网络时代”,有失公允;而“信息时代”则失之宽泛;至于“对等传播”和“媒体融合”只是对未来传媒一种特征或一种现象的描述,尚不能构成对一个传播时代的定性式概括;“跨媒体”则是经营学名词,它是传媒集团为做大做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混合兼营策略;“后传播时代”倒是有些许哲学色彩,但它强调“网络对传媒的解构”,而疏于对学理概念的诠释。

笔者认为,使用具有规范学术意义的“超媒体”来冠名正在到来的新传播时代十分恰当。一是因为未来媒体所能提供的多种服务尽在超媒体技术名词的界定之中;二是因为超媒体已经突破了纯技术的视野,正在多方位涉入人文管理领域。况且,超媒体时代本身还有着从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巨大空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超媒体与VR(虚拟现实)、AV(增强现实)相结合

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让用户体验到一种超现实沉浸式场景观感。超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可以发展为智能超媒体,即在超媒体的链和结点中嵌入知识或规则,允许链进行计算和推理,这一“推理引擎”使它能够主动获取信息并反哺网络,使信息提供更加精准;超媒体与分布式处理技术相结合形成分布式超媒体,可以使多个网络用户共同创建和使用信息,便于彼此协同工作;可以在不同系统共享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开放性的更大的超媒体信息空间,实现高度互联的全球化云计算超媒体。仅就技术研发而言,上述预见可以在几年至十几年内实现,但是,与之配套的运营规则和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思考传播时代的划分时,切莫轻言封“后”。

超媒体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传播的价值在于互通。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才能让信息资源充分自由流淌。我国正在实施“宽带中国”和“互联网+”战略,预计到2020年,宽带网络将基本覆盖所有城乡,打通网络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智能互联将使超媒体应用覆盖更多领域,与精准服务互为表里,人民生活与社会治理将随着超媒体时代到来而发生极大改变。

我们正在走向超媒体时代。最早认识当今传媒变革属性的人,将是在这一时代最早收获、独领风骚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注重培养一批具有超前思维、通晓世界最新观点和传播技术、具备优秀职业道德素质的全能型人才,尽早跨入超媒体领域并对它进行研究、探索、实践,不仅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必然选择。

注释:

-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张君昌:《超媒体时代》,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张君昌:《超媒体时代》,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托马斯·鲍德温等:《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戴维·哈尔伯斯坦:《无冕之王》,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转引自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6日于乌镇。

作者系中国广播影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部主任、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黄耀华